

八十自述

今年（2018年）是我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研究生四十周年。我的一生，也就以1978年為界，分為「前半生」（三十九年）和「後半生」（四十年）。前半生又分為兩段：1939–1960年，從出生到21歲，主要是一個學習、成長階段。我5歲上學，先後在中央大學附屬小學、上海愚園路小學、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中學，以及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可以說是在中國最好的學校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為一生的學習、做人打下了較好的基礎。1960年21歲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貴州，在那裏工作、生活了十八年，在中國社會的底層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在艱苦的磨練中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同時也在孤獨寂寞中堅持作學術研究的準備，由此決定了此後一生的發展。

1978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王瑤和嚴家炎先生後，開始了自己的學術人生。大體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8–1997年，是接受正規的學術訓練，以成為一個體制內的學者為追求的二十年。1997年，

在獲得了學院體制的承認以後，又為學院對自己的束縛感到不安，在貴州形成的生命中的野性的驅動和魯迅的啟示下，破門而出，開始介入社會，發出獨立的批判的聲音，由此走上「學者兼精神界戰士」的道路。以學者的身份，並以學術研究的成果作為思想資源，參與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推動青年志願者運動和鄉村建設運動，立足於民間思想啟蒙與社會自治運動。2002年退休以後，又逐漸走出現代文學研究專業，開始了現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和精神史的研究，以及地方文化研究，並更深入、自覺地參與民間思想運動。但經過十多年的觀察與思考，認定中國社會和學術將進入一個更加複雜、曲折、嚴峻的歷史時期，於是在2014年末，宣佈退出學術界、教育界。2015年搬進養老院，開始作「歷史與現實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批判者」，更自覺地繼承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史官」傳統，作有距離的更根本性的思考，並以創建對現當代中國歷史具有解釋力與批判力的理論，作為自己的追求。這又是一個重要的選擇：用「以退為進」的方式，走完自己最後一段學術、人生之路。

這樣，經過四十年的不間歇的耕耘，在學術上終於有了收穫：到2017年共出版著作87本（加上寫好未出的應是91本）。在已出版著作中，除去選本，實際寫作70部；如以每本三十萬言計，應有兩千一百萬字，未發表或出版的還有二百萬字，總計約兩千三百萬，平均每年寫作五十萬言。四十年編輯或主編的書，已出54部，加上準備出的共有59部。保守一點計算，至少也有兩千餘萬字。這樣，積四十年之努力，所寫所編的著作就有150部，總字數在四千萬言以上，平均每年一百萬字。

這樣的四十年如一日的寫作，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現代文學史寫作」，我給自己的學術定位是「文學史家」，要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上形成獨立的文學史觀、方法論，獨特的結構方式，敘述方式。因此，儘管我參與寫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產生了很大

影響，我自己更看重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三卷本和準備寫的《錢理群新編現代文學史》。此外，「現代文學學科史上的學人研究」也是我感興趣的。另一個學術重心是「20世紀中國歷史經驗教訓」的探討與總結，進行現當代思想史、精神史的四個方面的研究。其一，「現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除前期完成的「魯迅研究」三部曲（《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魯迅遠行以後》），「周作人研究」三部曲（《周作人傳》、《周作人論》、《讀周作人》），以及曹禺研究（《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世界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外，還寫有「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1948：天地玄黃》，《1949-1976：歲月滄桑》，《1977-2005：絕地守望》）。其二，「當代民間思想史研究」，也有三部曲：《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燭火不息：文革民間思想研究筆記》、《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間思想研究筆記》。其三，「當代（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同樣形成三部曲的格局（《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一個十年觀察與思考（2009-2018）》。其四，地方文化研究，主要成果是主編的近200萬言的《安順城記》。以上將近20部著作集中了我主要的研究成果。此外，還有大量的關於教育（大學教育和中小學語文教育，以後者為主），關於當代志願者文化，民間社會運動，關於鄉村建設（包括貴州建設）諸多方面的論述，代表作有《語文教育門外談》、《語文教育新論》、《二十六篇——與青年朋友談心》、《論志願者文化》等，最能顯示我的社會關懷和責任，並產生了一定社會影響。

在這些大量的學術和社會活動的背後，是有精神支撐的：這集中體現在我的人生座右銘上，這也是在文革中的貴州「民間思想村落」裏形成的；2002年退休時最後一堂課上曾將它留贈給北大大學生。一共

有三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永遠進擊」（魯迅）；「在命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也絕不回頭」（文革中流傳的毛澤東語）。這是可以來概括我一生的堅守的：永遠在探索，永遠保持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無論遭到怎樣的壓力也永遠不回頭。在 80 歲的回顧裏，這是最感欣慰的。

於是，又有了我的三大人生經驗。一是「永遠和青年人保持密切的精神聯繫」：不僅以青年作為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對象，而且自覺從年輕一代中不斷吸取精神資源和力量，使自己生命永遠保持青春活力。其二是「自覺構建兩個精神基地」。我的人生與學術道路之所以有自己的特點，追根溯源，就在於我和處於落後邊遠地區的貴州和被視為「精神聖地」的北京大學都建立了血肉般的聯繫。我曾經說過，「出入於社會的頂尖與底層，中心與邊緣，精英與草根之間，和學院與民間同時保持密切的精神聯繫，這是一種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的基本經驗」。以上兩點，我已經多次談到；現在我還想補充第三點，就是人生很短，個人精力和時間也有限，因此，在學術和人生上要有所得，就必須有所棄。我的經驗，就是對自己想做、願意做的事（對我來說，就是讀書、寫作）要竭盡全力、心無旁騖地去做；對於不是自己追求的事，就堅決不做或少做。這就需要學會拒絕，特別是拒絕誘惑。我之所以能連續四十年保持每年編寫 100 萬字的數量和速度，就是因為我幾乎拒絕、放棄了一切「身外之物」，但我卻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甚至有了超水準的發揮，從而獲得了生命的意義與樂趣。這樣做，當然也有問題，所以我一再強調，這帶有很大的個人性，並不足以效仿。但在這個充滿誘惑的時代，我的「拒絕誘惑」的經驗，大概還有點意義。

這就談到了八十人生的缺憾。首先，我的學術研究的一切成果，都有待於歷史的檢驗，尤其我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批判性，探索性，這就更需要用時間來證明其是否立得住，有沒有價值。我的學術研究

確實是為了探索真理，但我自己卻並非真理的掌握者、壟斷者和宣講者，我的研究得出的所有結論都是可以質疑的，我歡迎，甚至是期待不同意見平等、自由的爭論。即使我的看法被證明有道理，但我在對研究對象有所發現的同時，也必定有所遮蔽：對真理的探索絕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此有價值的學術也永遠是有缺憾的，我稱之為「有缺憾的價值」，這是規律，我也這樣看待和評價自己的學術。

更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自身的先天不足，或者說是我們這一代先天的不足，給自己的學術研究帶來的損傷。我在前面談到，我在青少年時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這也是和此後的教育比較而言。應該說我在上一世紀 50 年代所受的教育，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的，特別是 1956 年反右運動以後，提出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文化」，這樣的強調「和傳統徹底決裂」的教育，就造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知識結構上的根本缺陷。具體到我，就是我一再說到的兩大致命弱點：不懂外文，古代文化修養不足，或者如我在自嘲裏所說，我不過是一個「無文化的學者，無情趣的文人」。這樣的根本性弱點，就使得我與自己的研究對象，特別是魯迅、周作人這樣的學貫中西、充滿文人氣息的大家之間，產生了隔閡，我進入不了他們更深層次的世界。這一點我心裏很明白。因此當人們過分地稱讚我的魯迅、周作人研究，我只有苦笑：我不過是這一研究領域的「歷史中間物」而已。更重要的是，知識結構缺陷背後的研究視野、思維能力、言說方式諸多方面的不足，這就形成了我的學術抱負（期待能有原創性的大突破，在理論上有所建樹等等）和實際能力與水平之間的巨大差距，可以說這是我內心的一個隱痛。現在作一生總結，也只能說自己是一個認真、勤奮、有特點的學者，學術成就是十分有限的。聊可自慰的是，我還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儘管一生磨難重重，至今也還難以逃脫，但我始終守住了知識分子的本分和底線。

另一個缺憾，是我的生命的過於精神化，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一個「精神人」，能夠吸引我，我願意全身心的投入的，只是精神問題。用老伴的話來說，我整天生活在雲裏霧裏，自己日思夜想的，和別人交往中談的都是思想、文化、政治、歷史和學術。這當然有特點，甚至與眾不同，但從我自己最關心的人性發展來說，這顯然屬於魯迅所說的「人性的偏至」。而對世俗生活的陌生、不懂，甚至無興趣，也造成了和自己在精神上最為關注的底層人民（包括貴州的父老鄉親）和青年一代之間的隔膜。這大概是一個人性、人生的悖論，有一種內在的悲劇性，甚至荒謬性。我明白於此，卻不能、也不想糾正，就只能這樣有缺憾地活着，一路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

2018年2月28日-3月1日

在當今中國與世界，我們將何為

——八十寄語

這是一位朋友從網上發來的一個問題：在當今巨變中的世界與中國，知識分子將何為？我覺得這個問題太大，籠統地談知識分子問題不好談，不如具體地談「我們將何為」。所謂「我們」，一是指「治學者」，即在大學任教或研究部門就職的學人，或者像我這樣的退休老學者；二是有了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的職稱，也就是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基本上作到了衣食無虞的知識分子。我不敢、也不忍把那些還在為基本生存條件而掙扎的年輕學者和在校研究生包括在內，但暗地裏還是希望他們當中真正有志獻身於學術的人，對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有所關注與思考。

首先一個問題，自然是如何認識「當今之中國與世界」。對此我陸續寫了不少，這裏只能概括地說，這是三個「新時代」：國際上，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轉向「群雄爭霸的後全球化時代」；國內由「走出文革」的鄧小平時代，「九龍治水」的江、胡時代轉向回歸毛澤東的「新時代」；在科學技術上，則開啟了「人工智慧新時代」。

更重要的是，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新時代」？這也是人們最感困惑之處：新時代帶來了太多的新問題。「後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沒有真相，沒有共識，原有價值、理想都受到嚴重挑戰的時代，更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缺乏安全感，讓人不知所措的混亂的時代。國內的「新時代」控制越來越緊、誘惑越來越多，是讓獨立知識分子難以生存，也最容易失去知識分子操守的時代。而人工智慧新時代更是向人的存在提出了挑戰，提出了「何以為人，人將何為」的根本問題。

但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新時代」也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出現了新的機遇。

「後全球化」時代面臨最大問題自然是全球性的危機。對全球性危機，我曾經有過一說法，叫「全世界都病了」，即現存的所有的社會制度（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所有的發展模式，所有的文明形態（無論是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還是中華文明等等）都出現了危機。但這也就意味着，現存的所有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的內在矛盾以及其內在的合理性（它們在今天的存在，以及繼續發揮作用本身就有一種合理性），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暴露。這就給重新審視所有的文明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大好時機。只要我們不落入「西方文明崩潰，中國文明崛起」的先驗結論和官方的政治引導，而是以科學的態度，面對一切客觀事實，對每一種文明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都不迴避其矛盾、弊端、危機，也不輕易否認其歷史與現實的合理因素。這樣，我們就能夠站在新的歷史高度，進行科學的總結與檢討：既總結經驗，也檢討教訓，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具有某種綜合性的、新的社會理想，新的價值觀念，以便為混亂的世界提供某種新的可能性，更準確的說，這將是一種多少有些新烏托邦性質的人類發展的可能性，它本身也需要實踐的檢驗。而這樣的對人類文明的重新審視、全面檢討，就不能拘於既定的理論、主義。在我看來，曾經給中國知識分子巨大影響的自由

主義與新左派的理論，在當下全球歷史與中國歷史的巨變中，都失去了解釋力，至少顯示了解釋力的不足。這是一個呼喚理論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歷史的新機遇。而且這裏討論的人類文明的重新審視、全面檢討，是在後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學者共同面對的歷史課題和任務，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空間。

說到中國的國內研究，我一直心存一個遺憾。早在 21 世紀開始的 2002 年，我就在〈科學總結 20 世紀中國經驗〉一文（收《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裏指出，在 20 世紀世界歷史發展中，中國始終處在歷史漩渦的中心地帶，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作出了巨大犧牲，忍受着難以想像的痛苦，並且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獨特的中國經驗」，但這樣的經驗又是與慘痛的歷史教訓糾纏在一起，就成了一個「燙山芋」，誰也不（不願？不敢？）去碰它。這就使得「20 世紀中國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始終是少有人進入的領域」。在我看來，「這是中國學術界的最大失職，這是一個必須償還的歷史欠帳」。將如此豐富、獨特的 20 世紀中國經驗和教訓（包括中國文學經驗教訓）提升到理論的高度與深度，創造具有解釋力與批判力的中國理論，不僅是中國學者職責所在，也是中國學者能夠為世界學術作出貢獻的一個最佳突破口。長時期將其棄之不顧，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遺憾。最近這些年，總結「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突然熱了起來，但這是出於政治需要的有着明顯的意識形態引導所致，很難說是嚴肅的科學研究。要麼被冷落，要麼被利用，這大概就是中國有價值的學術研究的宿命。我這裏要說的是，對 20 世紀中國經驗的理論總結之所以舉步維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儘管它的研究動力來自現實，但真正進入研究，又必須和現實保持距離，沉下心來，作長時期的超越性的思考和創造。而中國學者的問題，恰恰在於坐不下來，過於緊跟潮流，多有一蹴而就的浮光掠影之作，少有長期積累、深思熟慮的研究成果。從這一角度來看當下的學術環境，一方面，必須正視言說空間的

日趨狹窄給學術自由發展帶來的嚴重損害，真正有擔當的學者也依然要尋找時機堅持對社會發言，作「絕望的抗爭」；另一方面，也需要以退為進，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真正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學術追求的學者，正可以藉此機會，沉下心來，作有距離的、長時期的、根本性、超越性的研究，即魯迅所謂「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這不是逃避現實，而是把對現實的關懷，轉為有距離的根本性追問和批判；而且不受現實政治的干擾，也不跟隨時代潮流，「管它春夏與秋冬」，只管營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一統」天下，在其中獨立思考，進行超功利的自由研究與創造；而且下定決心，「板凳甘坐十年冷」，耐住寂寞，不怕孤獨，同時也自得其樂，積十年、數十年之功，自會有大成果，大收穫。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以至世界歷史上，都不乏在政治黑暗時期出大作家、大學者的先例，即所謂「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腳，《兵法》修列」。我經常激勵自己說，今天我們的處境再差，也比司馬遷要強得多；我們成不了司馬遷，但他那樣的「發憤著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精神和中國文人傳統，還是應該借鑒和繼承的。

再說「人工智慧的新時代」。它固然對人的存在本身提出挑戰，但也給人的發展提供新的方向與機遇。我在2017年有個演講，講到人工智慧的發展，把人逼到「回歸人的本質」之道，即要做機器人不能替代的「人」，創造不能替代的「人」的文學藝術，「人」的學術，「人」的教育，這就意味着要從根本上改造和提升人的思維、能力。最近，我又讀到兩位科學家的文章和講話，提出了「原始創新，顛覆性創新」的概念，指出「人類是在不斷建立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的過程中更好地成為他自己」的，因此，對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對現存世界中某些東西的超越和否定的批判性思維」，要「入世而不屬世」，始終和現存社會既定的公論、共識、權威結論，保持一種張力，進行「理